

南朝四史与 南朝文学研究

张亚军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南朝四史与 南朝文学研究

张亚军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南朝四史与南朝文学研究/张亚军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 7

ISBN 978-7-5004-6302-3

I. 南… II. 张… III. ①中国—古代史—南朝时代
②古典文学—文学研究—中国—南朝时代 IV. K239.104.2
I20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00862 号

责任编辑 郭 元

责任校对 陶 琦

封面设计 王 华

版式设计 戴 宽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0(邮购)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华审印刷厂 装 订 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07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 1230 1/32

印 张 11.375 插 页 2

字 数 300 千字

定 价 30.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我有好多年在学校里教中国古代文学史的课程，经常感觉到不太清楚的一桩事情就是：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或者说我们认为是那种样子的文学史的面貌，究竟是怎样形成的？

当然，首先是有很多人在不同的年代、不同的地域、不同的场所从事书面或口头的文学创作，但那都是单独发生的事情，即使是多人参与的文学活动，如帝王招聚的宴游，每有文士赋诗唱和以助成风雅，也只是规模较大而已。那么，众多散在的创作所得之成果，是经何种力量、由何种途径，或被淘汰，或被存留？而写作者即我们所称的“作家”、“诗人”，又经过什么样的过程，或湮没无闻，或流芳后世？优秀不优秀固然很重要，但并非总是决定性的因素，因为就连“优秀”的标准也会因时代及其他条件的变化而发生程度不等的差异。王道士打开敦煌藏经石窟纯粹是一个偶然事件，我们却由此知道竟有那么多的优秀的创作倘非侥幸就将永远朽碎于尘土。

对历史大概可以作这样一种粗略的描述：在过去的时间里实际发生的一切活动，这是一种历史，我们暂且叫它“历史 A”，它一旦过去就不能重复和再次进入；由“历史 A”所产生的文献——从文学史的角度来说，就是被记录和得以流传的作品，以及关于作家活动的记载和评议，也是一种历史，这可

以叫作“历史 B”；后人根据“历史 B”试图对“历史 A”进行一种具有价值判断意义的、归纳性的描述，又是一种历史，这可以叫作“历史 C”。这三者不可能等同。从“历史 A”到“历史 B”，有某种选择机制在发生作用；而具有哲学意味的“历史 C”更离不开描述者当下的立场，这包括观察方法和价值准则、利益需求，等等。所谓“历史”的面目其实从来都不是稳定不变的，从文学史来说，它总是处在被反复描述、也就是一再被“重写”的过程中。最初很受重视的东西，在后人看来或许没有多大价值；反之，过去被轻忽、甚至已经被淘汰的东西，在后人看来可能非常值得珍视，这样的例子多得很。

我们已经习惯了依据现存的作品——尤其是在漫长的年代里被经典化了的名作——来想象和描绘一种文学史的面貌。但想要深刻地理解中国文学的发展演变过程，这是远远不够的，各种或明或晦的因素怎样影响每一时期文学面貌的形成，也许更值得关注。举例来说，《诗经》作为中国文学的源头，它的若干特点直接影响了后世文学的发展进程。孔子曾以“温柔敦厚”四字概括《诗经》的精神气质，这是说得相当准确的。倘若将《诗经》中属于歌谣性质的《国风》与产生年代相去不甚远的《旧约》中的《雅歌》和古印度史诗《罗摩衍那》相比，会发现一个显得很特殊的现象：《国风》中虽有不少情歌，但它写女性的美，至多也就是到“肤若凝脂”这样的程度，它非常谨慎地回避具有性特征的描写。而《雅歌》和《罗摩衍那》却完全不是如此。从普遍的情形来说，性总是歌谣的一个兴奋点，而《国风》何以如此优雅？这大概只有放在周代文化系统中来解释。其实我们不知道和现存的《国风》诗篇同时产生而未能流传的作品是什么样的，但《诗经》是

如今这个面貌，无疑有一种历史机制在起作用。

如果想要系统地追究我们现在所知的中国文学史的面貌的形成过程，分析历代史籍对文学人物、文学活动及文学作品的记载与评论，应该是一个重要的途径。中国人以极端重视历史记载著称，留下的史籍之完整与丰富无与伦比。史家在广泛的范围内关注人类的生活，政治固然是他们所理解的历史的中心，文学却也是其中一个重要的部分。我曾经设想：如果挑选出若干特别重要和具有代表性的史书，我们至少可以对这样一些问题进行考查：各时代文人主要著作类型的变化，文人社会身份的变化，通过史家的文笔体现出的社会主导意识形态对文学关注程度的变化及其对文学价值的认识的变化，各时代最受重视的文体与文学主题，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文学评价以何种方式展开、文学声誉如何获得，以及当代评价与后代评价的差异及其理由等等。通过这种查考和分析，我们或许能够比较深入地理解文学史形成的有机过程。

1999 年，张亚军从河南大学来到复旦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在讨论博士论文选题时，因为她的硕士论文是《〈晋书〉列传的文学色彩》，我就和她商量是否做《南朝四史与南朝文学研究》，这两者有相似之处，但研究的方向和关注的问题却有很大变化。至于为什么选南朝四史，主要原因并不在于从两晋到南朝的历史顺序——这到底无关紧要，而在于四史本身既相互联结，又具有同样的显著特点：四史的作者，都曾生活于他们所记录的朝代，因而四史都有点当代人作当代史的味道。他们的论述虽未必因此而变得更“正确”，但至少在情感上更为亲切。我想这会减少由于年代相隔久远而产生的误会与隔膜。

选题虽然是我们共同商量的，整篇论文的完成却完全是亚军努力的结果。这个题目看起来颇有新鲜感，着手写却并不容

4 南朝四史与南朝文学研究

易，需要处理许多复杂的问题。我至今还能想起她因有所得而高兴，因进展不顺而愁闷的样子。如今这篇论文有了正式出版的机会，这真是值得庆贺的事情。亚军让我为此书写序，我昔日忝为导师，说太多夸奖的话恐怕被人讥为偏私，就兜着圈子说了一些跟论题有关的想法。不过，我确实知道张亚军是非常用功的，她对这个论题有相当深入的思考，提出了许多富于创新意义的见解，这，读者可以从书中得到验证。

骆玉明

2007年3月于复旦大学

目 录

序	骆玉明	(1)
引言		(1)
第一章 南朝四史概述		(5)
第一节 南朝四史产生的社会背景		(8)
第二节 南朝四史的作者及成书简况		(36)
第三节 南朝四史的特点		(45)
第二章 南朝四史中的文学成相（一）		(52)
第一节 史传人物的文学定位		(52)
第二节 史传人物的文学赏会		(64)
第三节 史传人物的诗歌选录		(77)
第四节 史传人物的文集记载		(98)
第三章 南朝四史中的文学成相（二）		(112)
第一节 “文学的自觉”刍议		(112)
第二节 史传人物由武趋文的形象转变		(120)
第三节 史传“文义—文章—文学”的概念变化		(140)
第四节 《文学传》人物的选择与转变		(152)
第四章 南朝四史的人物刻画		(177)
第一节 史传人物外貌描写的继承与创新		(177)

2 南朝四史与南朝文学研究

第二节 史传人物学艺修养的体现与表述	(190)
第五章 南朝四史史臣的文学观	(204)
第一节 文德观	(204)
第二节 丽辞	(213)
第三节 新变	(223)
第六章 南朝四史之史论	(229)
第一节 总结性	(229)
第二节 骈俪色彩	(248)
第三节 抒情色彩	(259)
第四节 理性与史识	(270)

附录

北地傅氏与傅亮	(285)
《宋书·谢晦传》小议	(302)
宋文帝论	(311)
论南朝社会风气与诗歌娱乐功能的发挥	(327)
参考书目	(348)
后记	(356)

引　　言

当我们现在来讨论中国古代文学——它的产生、发展、演变过程，文学家从事文学写作的理由，在某个特定时代中文学创作活动与其他社会现象的关系，等等——时，我们不能不首先意识到一个最基本的事实：在过去的时间里曾经实实在在发生过的一切，都早已随着时间的消逝而消失了，我们不可能变生作为“在场者”来认识历史的过程，我们所面对的只是文献——所谓“故纸堆”。而关于古代文学的文献，主要是由两大类组成的：古人留下的作品，关于过去的文学活动的记载和评述。

文献是我们认知和理解历史的依据，但文献却又绝不可能等同于实际发生过的“历史”。就拿存世的文学作品来说，即使撇开难以避免的讹误这一层不谈，这些幸存的作品由于脱离了曾与之相伴而生、却已淹没在时间长河中了的更大数量的亡逸之作，因此，它们已不再能够全面地再现历史上的文学面貌。至于说在另一种类型的文献中，我们看到的更只是在他人的视野里所呈现的事物的样态：什么东西是重要的因而值得被记载下来，什么东西不值得记载，这种选择本身即包含了评判的态度；再者，一种被选定的事项最终被描述成什么样的结果，又离不开与特定社会条件相关联的作者本人的趣味与好

恶。——这一切都没有什么可以抱憾的，我们正是从这里进入历史。问题只在于我们需要经常提醒自己：我们所面对的只是文献，而文献有它之所以如此的原因，因而它是有待于解析的对象。

本文所要处理的问题，从一个大范围来说，是中国古代正统史学对文学的反映，具体则落实在南朝四史——《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与南朝文学的关系上。

正如人们经常说起并引以为骄傲的那样，中国古代历史记载之丰富、系统、完备，在世界文化中是无与伦比的。这反映出先人对自身文化传统的重视，以及一种不间断的通过总结前代成败兴亡之由来确认现存秩序的合理性、维持其始终运行于正当轨道的努力。“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①自司马迁著《史记》始，史学所关注的就不仅是事实，而且——也是更重要的——是真理；史家的笔永远承担着批判的功能。而以历代官修史书为主构成的正统史学体系，也就代表着古代社会上层、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对人类社会生活及其合理规则的认识与界定。

那么，作为人类重要的精神生活内容之一的文学在正统史学中被置于何种地位呢？当然它不可能是史家撰作的中心，但却也一直受到程度不等的关注。像分别代表着两汉辞赋成就最高的司马相如、扬雄，虽说他们均对自己未能将才智运用于他们认为是远比文学重要的其他领域而表示某种羞愧，但《史记》、《汉书》还是为他们立了专传，并不惜以宏大的篇幅来载录他们华丽铺张的赋作，至今我们仍然能够通过这种物化存在状态（字符与页面数量）来感受辞赋在汉文化中的地位。

① 司马迁：《报任安书》。

之后，《后汉书》首次设立《文苑传》，而《宋书》则在《谢灵运传》之末以“史臣曰”的名目简述了到刘宋为止整个中国文学演变的大略过程。尽管分别而言史家对文学的态度、处理方法每有不同，但总体上说，文学在正统史学中受到的关注越来越多，有关的记载和评述越来越丰富，这是一种基本的趋势。既表明文学本身的发展，也显示了在上层社会中文学的价值正在不断提高。当然，正如前述，史家并不是漫然地陈列事实，文学家的生平、文学活动的过程，这一切事项的记载都必然是选择和重新组合的结果，其中已经隐含了史家对所涉对象的见解；至于由史家直接站出来说话的序、论、赞一类文字，更是带着权威口吻的主观评价。而这一切，便是后人认识古代文学有关“事实”和“是非”的最基本的知识来源和判断依据。

我们对古代文学的理解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历史著作；对唐以前的文学，由于材料缺乏，因而这种依赖更为严重。也许这种依赖是不可避免的，但也正因如此，对史书关于文学的记载、评述进行解析，恐怕尤为重要。所谓“文学史”并不只是先后相继的写作的累积；在其每一个环节上都存在着选择、评判的活动，它积极地影响着文学写作本身的承袭与变化。通过解析过去时代中作为主导意识形态之代表的官方史学对文学的态度、其取舍与褒贬的准则，在一个特定时代中文学被如何看待，文学活动、文学现象被怎样加以总结和描述，以及它对文学写作走向的影响，我们有可能更为接近历史上曾经发生的文学现象的本来面貌，有可能深入理解文学史形成的有机过程。

至于本书实际研讨的关于南朝四史与南朝文学之关系的问题，我想有几个特点是值得首先提出的。

其一，四史均是官修“正史”，均作于其所记载的朝代倾覆未久的年代，能够代表一个朝代对前一朝代历史的官方立场，反映我们所说的社会“主导意识形态”对文学的态度。同时，四史前后相衔，其文学观的变化也有很多值得注意的地方。

其二，四史虽大体是由后人为前代作史，但实际上其作者均曾在前一朝代生活过；也就是说，他们所记述的时代对于他们而言，既是“历史”，也是“当代”，他们所记述的事件对于他们而言其实是很亲切的。如《宋书》作于南齐，而作者沈约曾仕于宋；《南齐书》作于梁，而作者萧子显为南齐宗室；《梁书》、《陈书》虽说至唐初才编定，其写作则始于陈，主要作者姚察于梁、陈二代均有丰富的生活经历。

其三，四史的作者均是当时著名文士，曾积极参与他们所记述的“文学史”上的活动，甚至是其中的重要人物。这虽不能保证他们的记述与评判一定“正确”，但他们对史实的了解毕竟是最为直接的。再者，“官史”的操作固然免不了会受到诸多牵制，但作为文学之士，史家仍然会表现出自己的文学趣味。因此，四史与文学的关系要比一般史书更为密切。

由以上几个特点来看，通过南朝四史达成我们在前面所提出的目标，即解析正统史学与文学的关系是特别合适的。只是，这是一种尚未有人系统展开过的研究，其复杂程度为笔者所始料未及。笔者虽有意于此，却大为才学所限，终了恐怕只是作了一次浅薄的尝试。唯一能够坚信不疑的仅仅是——这种尝试是有意义的。

第一章 南朝四史概述

在中国史学史上，南北朝时期的史学发展呈现兴盛的面貌，尤其是南朝二百年间，私撰史书数目剧增，盛况空前，无论史书的数量还是类别都取得了不俗的成绩。当时人对史著写作的热衷程度可谓空前绝后、不同凡响。后来的历史学家一般持两种观点：一是认为此期史学是中国史学发展的重要中枢时期，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确定了正史的最终体例。^①而另一方面，也有一些学者虽然承认此期史学的发展状况良好，然而，置其于中国古代史学发展的整个过程中，则以为南北朝史学乃是史学的中衰，“从班固《汉书》到陈寿《三国志》，范蔚宗《后汉书》乃至其他在《隋书·经籍志》里所见的史书，大体都是在走下坡路”，^②“从陈寿、袁宏到沈约，只表示了正宗史学的趋向

^① 周一良在《魏晋南北朝史学发展的特点》一文中总结为以下几点：一、史部著作的独立。二、设立专职史官。三、史书种类与数目骤增。四、编年体与纪传体并行。五、谱牒之学兴盛。六、佛教与道教史书的建立。见《魏晋南北朝史论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84页。

^② 见钱穆《中国史学名著》，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135页。

6 南朝四史与南朝文学研究

没落”。^① 这是一个乍看起来令人颇感费解并感到矛盾的问题。数量的骤增并未能使史学的发展趋向高峰，也并未能使史学的发展创式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这是为什么呢？史学系统是一个极复杂的系统，它所做出的要求，不仅仅表现在对于一个史学家在史才、史学、史识等方面的要求，而且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它也难以辞脱种种变因下的客观影响，正如数量虽然有增，产生了几部正史，并且诸杂史杂传以及各种史学体裁的创作也为唐初官修史书奠定了基础，然而，这毕竟是中国史学史上旧史学即将没落的时代，也是私撰史书即将消歇而为官修史书所替代的时代。就此意义而言，南北朝时期史学家们的创作保存了大量的文献资料，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促进了新史学的成长，它的功绩是有目共睹的。

史传文学是从文学的角度看待历史文献，那么，我们今天从历史潮流的发展变化中来看文学，又将呈现出一种什么样的面貌呢？

我们知道，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文学、史学发展的重要阶段。一方面，史学摆脱经学的附庸地位趋于独立；另一方面，文学和史学随着客观条件的成熟而逐步分离，各自发展成为健全而完整的体系。史学作为独立的系统存在于文学之外，文学亦从史学中汲取营养，从而在艺术形式的多样化和内容表达等

^① 见白寿彝《中国史学史论集》，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153页。持此观点者还有王树民：“古代史学发展到官修史书阶段，实际已经走上绝路。”《中国史学史纲要》，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88页。其实，隋唐之前的史书，大都是私人修撰，有的单纯是个人的力量，有的是利用了官方的资料敷作而成。不过，这种自得之学的史书修撰方式很明显与之后的官修史书在学术思想、历史观的形成与行文表现方面存在很大差异。

方面得到进一步的升华。然而，这一过程并不是瞬间的清晰的决断，而是一种难以割舍的牵连，是在各自逐渐发展、演进、成熟的过程中得以体现的。史学与文学之间是有机互动而又相互渗透的关系。南朝史学著作中保存了许多有关文学的重要信息，记载、反映与评价着时人的文学创作与文学活动，呈现出丰富的文学面貌和深厚的文学底蕴。本课题就是以南朝史书中的文学面貌为基本出发点，亦即由南朝四史《宋书》、《南齐书》、《梁书》和《陈书》中所体现出的各种文学现象，如史传人物的文学修养、文学活动、文学观念等，分析当时人对文学的看法与评价，力图还文学于其所产生的社会环境中，恢复原本的真实面貌。

文学作为历史学范畴之一，它是随着历史的演进不断被结构、解析、流传和确定下来的。古人的描述与今天我们所看到的文学史的描述，虽有所趋同，却也有所不同，势必存在古人看古人与今人看古人的种种差异。探索史传人物的形象塑造，最根本的方法就是：首先，要从史书的记载中勾勒出他的事迹、他的行实，看看他是怎样的一种历史定位，呈现出何种性格与风貌。其次，就是根据史传人物遗留下来的文字记录，包括其作品、交游，捕捉他对生存环境的种种感受。再次，就是联系时人和后人的评价，给予一种明确的价值定位。惟其如此，对于史传人物文学面貌的揭示才告圆满。诚然，从这一角度讲，探究史书中的文学现象是十分必要的，它不仅详细提供了有关文学发展的诸项内容，而且随着史学史的发展，史书，尤其是私撰史书对文学方法的吸收及其对文学的覆盖与冲击都是不言而喻的，如文学的兴盛对史臣撰述方法的影响，史学的发展在文学观念、文学表现形式诸如隶事用典等方面的表现等等。南朝史书所透视出的文学脉迹与史书作者对文学现象的反

映和评价承受着种种客观与主观、有意与无意、自然与非自然的因素影响，在史学家的眼中，文学是怎样的？是以何种标准与原则去评判的？尤其是被史学家列为《文苑传》、《文学传》中的人物有何特点，怎样界定，与今天的文学史所认可的文学人物有何不同，为什么？这些都将是本书所要探究的问题。总之，文史之间是一种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相互吸收的关系，无论史学还是文学，南朝阶段的撰著与研究，前承两汉，后启盛唐，都因其处于一个独特的交替时代而呈现出与众不同的光辉色彩。

第一节 南朝四史产生的社会背景

南朝是文学与史学颇为兴盛的时期，文史成为当时士族特别注重的素质修养和立身扬名的凭借，帝王通过崇尚文史来显示统治的良善，甚至以此作为证明其政权正当性的根据。南朝四史成书情形各有不同，要之，均与上述时代风气密切相关。

在中国古代史上，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一个社会动乱、政局不稳、朝代更迭较频繁的时代。向历史求智慧、从往时兴乱中思考现实的道路，成为人们迫切的精神需要。《三国志》中言：“（孙）权欲（孙）登读《汉书》，习知近代之事。”^①又《世说新语·言语》中载：“（西晋时）诸名士共至洛水戏，还，乐广问王夷甫：‘今日戏乐乎？’王曰：‘裴仆射善谈名理，混混有雅致；张茂先论《史》、《汉》，靡靡可听；我与王

^① 《三国志》卷五十九，《孙登传》。